



文章编号: 1009-6000(2011)10-0008-06

中图分类号: F293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蒋贵凰 (1982-), 女, 北京城市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管理与城镇发展, 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等;

宋迎昌 (1965-),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规划, 城镇发展, 城市管理等。

中国城市贫困状况分析及反贫困对策

Urban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Policy in China

蒋贵凰 宋迎昌

JIANG Gui-huang SONG Yin-chang

摘要:

随着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 城市贫困问题已备受关注。基于统计数据测算, 我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大约在人均年收入 7500 ~ 8500 元之间, 贫困人口数大约为 5000 万人, 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 2 倍左右。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其中东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最低, 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研究深刻分析了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依照我国国情提出城市贫困监测、城市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及反贫困路径的拓展等多方面反贫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城市贫困; 贫困标准; 反贫困对策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urban poverty and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urban rich and the poor, urban poverty has become a cause for concern.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the paper estimates that China's current urban poverty line should be between about 7500-8500 Yuan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poor population may reach 50,000,000, about 2 times the current minimum standard and the number of insured. By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the proportion of poor people is lowest in eastern, and higher in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study provides analysis of the root causes of urban poverty, and brings forward some strategic choices to release the urban poverty in China according to our national conditions. At last, it proposes some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poverty monitoring,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crease and expansion of the path of anti-poverty, etc.

Key words: urban poverty; poverty standards; anti-poverty policy

1 城市贫困的概念

根据人们对贫困的不同理解, 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通常指最低基本生活没有得到保证, 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生存性贫困。相对贫困是指温饱问题虽已得到基本解决, 但生活水平仍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世界银行将收入少于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的社会成员视为

相对贫困人口, 有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收入 40% 的人归为相对贫困人群。

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 都反映了缺乏足够收入来维持一种社会认可的生活标准的状态。工业革命以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镇化使得城市贫困问题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在

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也逐步扩展和深入,从最初基于单纯物质范畴逐渐扩展到一个涉及社会、文化、政治、教育、风险、健康等领域的综合范畴;从“缺乏”的角度逐步扩展到“社会排斥”、“社会权利”、“能力”、“社会地位”等多种角度的综合。城市贫困不仅指贫困者的全部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需求,而且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乃至肉体和精神等各个方面的匮乏。

城市贫困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人口的迁移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产生的。从表面看,贫困是由于收入低,而难以满足起码的生活水平,缺乏物质和服务,从而不具备与他人相同的权利去选择健康、长寿、自由和体面的生活,受到社会排斥,但深层原因是缺乏手段、能力以及机会。

2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由来

在1990年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城市贫困人口相对较少,但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贫困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1997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造成的“下岗”和“失业”问题,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加速了城市贫困的恶化,使其也成为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方面。20世纪末,为使经济能够保持快速、高水平的增长,全力推进城镇化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然而城市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却又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物价的不断上涨、社会保障措施的不力、房价的频频攀升、就业形势的严峻、

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陷入相对贫困之中。

从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构成来看,除了“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和无法定抚养人”的“三无”人员构成的特殊人群外,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调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的部分农村人口;城市居民中老、弱、病、残、孤、寡等传统贫困群体所占比例缩小,贫困人口主体主要是由于结构变迁催生的下岗、失业等新贫困层。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往往收入水平低,营养条件差,住房条件简陋,难以应对教育和医疗支出。即使一些人享受到低保金,但低保金根本无法弥补日常支出的不足。城市贫困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稳定,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将对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巨大障碍。

3 中国城市贫困状况估算

对贫困界定的国际标准是1990年由世界银行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提出的370美元,即1天约1美元,目前国际标准大约为每天1.25美元。中国在对1986年确定人均年纯收入206元为农村贫困线的基础上,逐年根据物价指数对其微调,2008年底至2009年初,调整为1196元,并预计2011年中国将把农村贫困标准上调到人均年纯收入1500元。

相对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缺乏统一标准,通常采用相对贫困的概念,即城市居民中一定比例的最低收入人口。借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的估算,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有3100多万,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总数

的比重约为8%,这一数据至今仍被多处引用。但究竟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到底有多大?由于标准的缺乏,自上而下的专项调查也尚未开展,因此对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准确的答案。

对城市贫困人口的估算,离不开贫困线和贫困测算方法的确立。目前对贫困测算的方法很多,总体而言测算方法主要包括比例法、绝对值法、恩格尔系数法、数学模型与调查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法)、基本需求法、基期固定法、马丁法、因子分析法等。各测算方法的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按照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中国截至2009年底的城镇人口数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其中,东部地区较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大体相当。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由于中国提供低保的资金有限,因此贫困家庭享受低保的条件比较苛刻,且标准线较低,所以城市贫困人口应远大于享受低保的人数。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调研情况看,城市贫困人口通常是享受低保人数的2倍之多,比例大约在7.5%~8.7%之间。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8%的比例,采用比例法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为5000万人。但不同区域的贫困线及贫困人口会因经济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为此,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数据,采取绝对值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测算城镇合理的贫困线,并将目前中国各地区平均低保标准和享受低保的人数作为参考标准,估算中国各地区的城镇贫困人口数,测算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1 常用的贫困线的测算方法

测算方法	具体含义
比例法	将一定比列的最低收入居民确定为贫困人口，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限为贫困线，通常这一比列为5%或10%。
绝对值法	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平均水平可支配收入的 50%或 6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
恩格尔系数法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提出恩格尔系数59%以上为贫困，按照这一标准，可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饮食费用除以59%做为贫困线。
数学模型与调查法	采用反映消费者行为的线性支出系统数学模型，根据对居民可支配收入、食品、衣着等八大类消费支出调查数据，计算出居民维持基本消费的所需费用做为贫困线。
基本需求法	用各生活必需品的最低需求量乘以市场单价做为贫困线。
基期固定法	用多种方法综合测算出某一时期的贫困线做为基期贫困线，再以3~5年为一个周期，用价格指数来对贫困线进行计算和修正。
马丁法	先根据能够满足一定能量摄入的食物组合测算出食品贫困线，然后分别加上最高或最低的非食品贫困线做为最高贫困线和最低贫困线。
因子分析法	通过综合分析收入、消费、生育、健康、文化和宏微观经济指标来确定贫困线。

上述绝对值法是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作为贫困线，恩格尔系数法，是将 2009 年底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平均每人食品支出做为最低生活需求费用，除以 59%所得。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合理的城镇贫困线在 7500 元到 8500 元之间。

从表 3 的数据还可以看出，若以低保标准作为绝对贫困线，享受低保的绝对贫困人口在东北地区所占比例最高，约 6.35%；其次是西部地区，为 5.91%；再其次是中部地区，为 5.12%；而东部地区最低，仅占 1.28%。可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绝对贫困人口越少，因此发展经济是减少绝对贫困最有效的路径。考虑到这种区域差异造成贫困人口比重的不同，结合比例法估算，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大约 756 万人，中部 1657 万人，西部 1717 万人，东北地区 845 万人。

表2 2009年各地区人口分布及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状况

	全国总计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总人口（万人）	133474	48442	35604	38544	10884
城镇人口（万人）	62186	27446	15047	13503	619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7175	20953	14367	14213	14324
城镇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元）	12265	14620	10031	10642	11129
城镇平均每人食品支出（元）	4479	5173	3774	4111	4025
城镇平均每人衣着支出（元）	1284	1349	1170	1236	1378
城镇平均每人居住支出（元）	1229	1434	1078	989	123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整理。

4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中国城市贫困备受关注，主要是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一些资源性城市逐渐枯竭，造成大量失业人群开始的。但从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长期存在，且形势严峻的深层原因来看，其根源来自于制度与政策、教育、就业、医疗等多个方面。

4.1 制度与政策方面

从宏观层面看城市贫困状况受到

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中观层面看受到单位、家庭和社会化组织供给的社会资源的影响，这些都与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制度政策相关。近 20 年中出现的企业改制下岗、疾病缺乏医疗保险、老人缺乏养老保险、城市拆迁矛盾、失地农民就业难等多种造成贫困产生的现象无一不与政企的制度政策关联。在中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下，贫困人群始终处于资源缺乏和无发言权的状

表3 不同方法测算的城镇贫困线及贫困人口数

	全国总计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按绝对值法测算的城镇贫困线（元/年·人）	8588	10477	7184	7107	7162
按恩格尔系数法测算的城镇贫困线（元/年·人）	7591	8768	6396	6968	6822
城镇平均低保标准（元/年·人）	3014	4592	3783	3254	3980
城镇享受低保人数（万人）	2311	350	770	798	393
低保人数占城镇居民比重（%）	3.72	1.28	5.12	5.91	6.35
比例法与区域差异相结合的城镇贫困人口数（万人）	4975	756	1657	1717	84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民政部2010年的统计数据计算。

态,这种状态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和福利政策的不合理及制度保障体系的缺乏。由于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和福利政策在贫富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不公平的现象,造成中国近十几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穷人收入不变,相对收入更低,富人收入大幅提高,从而产生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局面。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和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7,目前已达0.5,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财富分配不均衡,城市贫民的生活境况的严峻性也由此可见一斑。尽管近几年中国出台了很多涉及民生的政策,完善了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力度不足、扶持资金有限和享受人群面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严峻。从近年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来看,人数不仅没有减少,还有增加态势。有学者在对1998~2009年中国36个城市“低保”标准变化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城市低保标准的增长率远低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加上近年物价高涨和CPI指数的不断攀升,城市贫困人口的实际数应是逐年增加的,反贫困的迫切性也进一步加大。

4.2 教育方面

贫困群体往往集经济贫困、知识贫困、素质贫困于一身。提高知识水平和就业的素质能力是摆脱经济贫困的有效路径,因此教育对脱贫是至关重要的。但从对享受城市低保家庭的调查情况看,大部分适龄子女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享受大专教育的屈指可数,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费用过高。中国1980年代中期,教育产业化的思想占上风,取代了教育公益化,

迅速增长的教育支出使很多家庭因教致贫,调查中一些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已高达30%之多。而对于原本贫困的家庭来说,大学1万多元1年的学费和城市高额的生活费使得子女享受高等教育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国家已对城市低保家庭子女给予了一定的教育补贴,但主要限于一定学杂费的减免,而这些费用在教育费用总支出中的比例正逐渐下降,且享受补贴的政策也比较苛刻。教育负担繁重使贫困家庭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因此,贫困家庭的子女通常在低学历和低技能的情况下就卷入了就业市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弱,收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反哺父辈的希望也较小,从而更容易形成“低人力资本投资—低就业—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的贫困恶性循环和贫困代际传递现象。

4.3 就业方面

在对城市低保家庭的调查中发现他们致贫的原因是多样化的,但是有些属于持续性贫困,需要享有长期低保政策,短期内难以具备脱贫的可能。而另一些家庭属于暂时性贫困,只要能够实现就业,通过一段时期过渡,即可摆脱贫困状况。对于第二类贫困家庭,提供就业扶持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类低保家庭的成员大多难以获得较稳定的职业,失业、不充分就业以及就业质量偏低,使他们收入低且不稳定,他们总是艰难地徘徊在基本生存需要、子女教育、疾病风险的多重压力下,步履维艰。随着中国用人单位对就业人员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就业技能的贫困家庭成员更难以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就业机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先天劣势及长期的

就业打击,促使这些人群容易形成丧失工作动机,听天由命,依赖低保的“失能”文化,这对城市反贫困造成了新的挑战。

4.4 医疗方面

城市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着就业难、生活难、住房难、医疗难、子女教育难和法律救助难等“六难”现象。其中医疗难是主要困难之一,在民政部的一项调查中,64.9%的低保家庭中就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慢性病或大病病人,医疗费用高使很多非贫困家庭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且由此无法摆脱贫困。近年,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已在绝大多数城市得到广泛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病致贫现象的产生。但仍存在两大难题,一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和流动人口不能平等地享受医疗保险带来的好处,一些地方因地方财力较差,未能做到应保尽保。二是,即使有了医疗保险制度,病人多,医疗水平设施不足,医疗水平差,医务人员供不应求,医药贵,乱收费等现象仍普遍存在,看病难,费用高始终困扰着贫困家庭,更多的人选择有病扛着,不敢就医。一旦小病拖成大病,这些家庭将进一步跌入贫困的深渊。

除了以上4项因素外,地区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也是贫困产生的原因之一。从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分布来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东北部的老工业基地和产业结构明显单一且对资源有着强烈依赖的城市。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现象,但经济的发展与城市贫困并非矛盾的,关键在于制度政策的有效配合。



5 中国城市贫困产生的社会影响

城市贫困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逐步加剧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第一，城市贫困阶层的存在容易形成不利于城市发展的“贫困文化”。在长期缺乏社会机会，受到社会排斥的情况下，贫困群体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他们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寻找脱贫之路。贫困文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困群体无法获得成功而采取的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已选择，但也反映了社会机会缺乏将使得部分贫困人群不得不改变心态，听天由命，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沉溺于现状。

第二，城市贫困现象的恶化会产生和加剧社会冲突。城市贫困的存在反映了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社会各群体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在城市经济、文化和生活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同时，贫困群体的生活环境却反差明显，这必然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们的被剥夺感强烈，经常存在悲观、失落、抱怨的情绪，甚至发表反社会的言行。当贫困群体在资源争夺过程中长期处于无权无利，被忽视、歧视和遗忘时，他们改变现状的办法只能是采取对抗甚至违法行为来与其他群体抗争，贫富矛盾的激化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安。

第三，城市贫困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增强内需，繁荣经济。贫困反映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这种失衡现象首先会造成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缺乏购买能力，这

不仅降低了大家对社会的信心和凝聚力，而且影响社会的总体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空间。其次，贫困群体往往从事的是较苦较累的工作，承受的是较差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过低的收入打击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加深了仇富心理，损害了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

第四，城市贫困不利于社会人口总体素质的提升。在对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中发现，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营养差，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都偏低。且贫困家庭的子女由于受到社会的排斥，从小与富裕家庭的孩子享有不平等的资源，容易造成心理阴影，影响身心健康。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的家中，“空巢孩子”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孩子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培养，许多孤独闭锁，心性冷漠，学业荒废。可见，贫困家庭孩子教育问题令人担忧，并直接影响着城市人口总体素质的提升。

此外，城市贫困会引发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贫民窟是贫困人口在城市空间上的聚集，它是城市贫困、社会隔离和社会排斥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由于恶劣的住房条件和卫生条件影响市容，而且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避难所，还有可能成为多种传染病肆虐城市地区的传染源。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城市贫困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必须予以重视，采取必要的反贫困对策，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6 中国城市反贫困的对策建议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情不同

于发达国家，若按照目前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和反贫战略，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无法支撑的。因此，必须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状况拟定适合城市反贫困战略的综合性减贫政策。这需要中国城市在兼顾经济发展、保障完善和素质提升的基础上，参考借鉴世界各地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实践经验，设计并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形成积极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6.1 建立一套城市贫困标准的监测指标体系及贫困线的测算方法

根据各地的财政实力、实际物价和消费情况，确定合理的贫困标准、贫困线、反贫困措施和扶贫管理体系。监测指标体系需能够及时地反映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准确掌握失业率和贫困群体的动态，确保贫困标准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相应的反贫困措施也应与社会发展情况相匹配，根据实际情况逐年进行调整，以适应城市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构建统一的城市扶贫管理体系，使扶贫工作制度化、社会化。

6.2 发展城市经济，合理推动城镇化进程

经济的增长和城镇化是密切相关的，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没有经济体系支撑的城镇化恰是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促进产业集聚，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贫困人口的数量和贫困度，充实用于贫困救助的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对于中国欠发达的地区，以发展消除贫困更具现实意义。此外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城乡人口的流动，因此还需采取

措施促使流动人口享受城市福利政策,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福利体制和公共服务设施,实现城乡平等。

6.3 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增加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

2011年的两会已提出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宗旨是:注重公平,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这需要首先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切实做到多劳多得,完善最低工资制。其次,需要改革中国的税收制度,使其课税方式更合理,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扩展和加强高等收入群体的征管力度。第三,通过税收及其它转移支付手段调整不同阶层、区域、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使收入分配向贫困人口倾斜。第四,尽可能地消除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行业、部门收入差距,加大再分配力度,缩小行业、部门间的收入差距。

6.4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低保覆盖面

市场经济注重效率,社会保障注重公平。低保可谓是社会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它解除了贫困群体的后顾之忧,保障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今后,中国应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加大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构成的3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扩大贫困扶持项目,形成多方面的综合救助体系;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覆盖在安全网内,从而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促进劳动者的合理流动;做到应保尽保,把失地农民、农民工及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也纳入覆盖范

围,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针对特殊贫困家庭,实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或廉租屋制度等,以减缓贫困压力;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完善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使解决城市贫民问题最终走上法治的轨道。

6.5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打破城市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恶性循环,促进就业

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应重点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致力于增强人的自主生存能力。加大教育和就业培训力度,将社会政策资金重点投向诸如能够改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促进就业、提高劳动者技能的社会项目上,重在提高社会群体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致力于消除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障碍。在政策的实施手段上,重视对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和子女的教育补贴,结合积极的就业扶持政策,增强贫困群体的能动性和战胜贫困的信心,创造有助于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条件。如激励贫困群体积极参加各类免费的短期、实用、容易入门和上手的培训项目,兴建汇集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失业保险和劳动保障事务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广开就业渠道,开发城市公共部门、社区的就业岗位,以相关的优惠政策或者补偿方式鼓励企业和事业单位吸纳贫困群体就业等等。此外,在教育 and 就业培训方面,还要注重中国目前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期,人才培养需与人才需求相匹配,以避免产业结构调整引发新的城市贫困。

6.6 多渠道地治理和遏制贫困,为民间资本进入城市贫困治理创造条件

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可考虑采取

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如提供优惠的税收、信贷、市场准入等各种可行的办法,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城市贫困治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慈善、救助方面的作用,建立起牢固、和谐、有效的伙伴关系。建立合理的信贷扶贫体制及金融部门的参与方式等。

综上所述,针对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应健全完善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广开渠道,综合治理,配套改革。以经济发展为龙头,以完善社会保障为目标,以促进就业为手段,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

参考文献:

- [1] 曹扶生,武前波.国外城市反贫困理论研究综述[J].城市问题,2008,(10):75-80.
- [2] 沈小波,林擎国.贫困范式的演变及其理论和政策意义[J].经济学家,2005,(6):90-95.
- [3] 王莉丽.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困境及低保的完善[J].生产力研究,2009,(11):104-105.
- [4] 朱庆芳.城镇贫困群体的特点及原因[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4):17-19.
- [5] 向国春,朱静秋,阎正民.界定贫困的标准研究综述[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6):358-369.
- [6] 曹艳春.1998-2009年我国36个城市“低保”标准变化及保障力度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9,(12):56-60.
- [7] 李晓红.城市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分析——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视角[J].城市问题,2010,(4):96-100.
- [8] 姚毅,王朝明.中国城市贫困发生机制的解读——基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0,(10):106-113.
- [9] 杨宇.城市贫困治理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179-182.